

范兆飛，《祖先光譜：中古士族的譜系與譜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年，380頁。

士族是中古中國重要的政治、社會階層，而士族譜系和譜牒具備甄別士庶的功能，是以深受學界關注。既往研究大致存在三種路徑：其一，文獻學路徑，即整理、輯佚和辨偽各種中古譜牒文獻，考辨各種譜牒的作者、篇幅和體例等情況；其二，譜學史、史學史路徑，即探討中古譜牒的類型、形式和功能，闡述中古譜學發展歷程和時代特點；其三，中古史路徑，即考訂士族譜系和婚宦信息，探討士族譜系編排和譜牒撰述的政治社會意義。不過，以往士族譜系研究偏重實證研究，闡釋略顯不足；而中古譜牒研究，則囿於史料，論述稍嫌籠統。

范兆飛長期關注中古士族譜系與譜牒，側重譜牒實證研究和譜系闡釋研究，並將二者有機結合。《祖先光譜：中古士族的譜系與譜牒》一書，作為相關論文彙編，即是作者在該領域研究的集中體現。本書除〈自序〉外，分上編、下編和外編三部分，共收入學術論文10篇，茲簡要評介如下：

上編「貞石證譜」包括5篇論文，圍繞中古譜牒形式、內容和功能等問題展開討論。〈士族譜牒的構造及其與碑誌關係拾遺〉〈中古早期譜系、譜牒與墓誌關係辨證〉二文為本編重心所在。作者肯定了陳爽提出墓誌特殊位置所載譜系源自譜牒的「假說」（陳爽，《出土墓誌所見中古譜牒研究》，上海：學林出版社，2015），但對陳氏復原的譜牒內容和形式提出疑議，綜合傳世文獻和墓誌提出中古譜牒「全貌」應包括姓氏起源、房支分化和近世祖先婚宦信息等內容，而這些內容分布於墓誌的不同位置，並有着不同史源。其他三文，〈胙土命氏：漢魏士族形成史論〉立足於長時段視角，提出兩漢大族貴族意識生長及其祖先追溯，成為魏晉以降士族構建譜系的來源，揭示了先秦貴族與兩漢大族、魏晉以降士族間的「重疊與連續」；〈行動指南——譚論中古譜牒的基本功能及實踐〉探討了譜牒在選官、通婚和追祖上的功能，將譜牒功能落實到士人具體的實踐運用上；〈南北朝門閥士族譜系的異同及意義〉考察了南北朝士族譜系內容和形式的異同，論述了北朝「單線」譜系與南朝「複線」譜系差異折射出的嫡庶身份、家族規模和宗法觀念問題。

下編「個案研究」包括3篇論文，立足於士族個案考察，探討了士族譜系的層累、虛實和變奏，以及譜系中祖先的時代和類型。〈中古郡望的成立

與崩潰〉一文，以太原王氏為例，指出士族譜系在真實的近世祖先基礎上，縱向疊加虛構的想象祖先，從而塑造或偽冒郡望，揭示了士族郡望從邊界嚴格到虛化的演變過程。〈中古士族譜系的虛實〉一文，以太原郭氏為例，提出士族譜系的「虛實相雜」面貌，即包括真實的血緣祖先和虛構的想象祖先，揭示了士族在「官僚化」血緣群體和「擴散性」同姓共同體間複雜的演變過程。〈中古士族譜系的變奏〉一文，以太原白氏為例，提出士族譜系構建通常將先秦秦漢姓氏譜系知識剪裁加工，嫁接到真實的近世祖先前；而本出龜茲的白氏由追祖祝融到改祖黃帝，從而實現「華夏化」。三文提出士族譜系祖先可劃分為上古聖王、秦漢英雄、六朝名士和近世祖先等，呈現出遠近、虛實、親疏等「雙軌制」特徵；探討了士族姓氏源流和虛構祖先何以如此，印證和補充了上編的論述。

外編「攬鏡自照」包括兩篇論文，基於國外學者研究評述，對中古士族研究路徑、理論和方法進行反思與展望。〈範式的形成與分合〉一文，以守屋美都雄《六朝門閥：太原王氏家系考》為中心，回顧了國內外士族個案研究的方法和路徑，從史料、問題、理論、方法等方面提出士族個案研究「可能的空間」。〈北美士族研究傳統的演變〉一文，以姜士彬(David Johnson)、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的士族研究為線索，梳理了英文世界士族研究的學術源流、問題關懷、基本路徑和理論方法，反思北美學人士族研究的特色和價值，尤其關注他們對人類學、社會學理論方法的運用。

縱觀全書各篇論文，作者對中古士族譜系與譜牒研究的新見解，主要體現在如下兩點：其一，作者在陳直、陳爽等學者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援引碑誌考辨中古譜牒，復原了中古譜牒的基本內容，即包括姓氏源流、房支分化和近世祖先譜系婚宦等；其二，作者提出士族譜系中祖先分為「真實的血緣祖先」和「虛構的想象祖先」兩類，並闡釋了虛構的想象祖先「是如何形成的，又有怎樣的意義」。其實，士族譜系中「虛構的想象祖先」，通常即著錄於譜牒中姓氏源流和房支分化部分；而揭示這部分內容在士族譜系中的位置和史源，闡明其構建的方式和意義，正是本書較諸既往研究最具價值的貢獻。

本書上述新見解，有力推動了中古士族譜系與譜牒研究的細化和深入，而這得益於作者研究理念和方法的更新，集中體現在對跨學科、跨斷代、跨領域對話的重視和提倡：其一，在跨學科方面，本書援引人類學、社會學理論方法，有意回應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弗里德(Morton H. Fried)、

陳其南等學人關於「宗族」「氏族」「房」等概念的界定，為理解中古中國士族的性質和範圍提供了新思路。作者還提倡藉鑒斯科特(James C. Scott)、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梁肇庭等不同領域學者的區域研究理論，考察中古地域集團或地方大族。其二，在跨斷代方面，本書在研究視野上提倡長時段研究，指出士族研究者「需要自覺打破斷代史的藩籬和朝代為限的人為分割」(頁35)，注重中古士族與先秦貴族、明清宗族比較研究；在史料利用上主張跨斷代「最大限度地開拓史料」，發掘近世碑誌和族譜中譜系文本，以彌補中古譜牒散佚的現狀，例如利用清代《琅琊王氏通譜》和宋人撰寫王氏人物行狀探討中古王氏譜系；在具體研究上，通過考察北宋韓琦家族構建祖先世系過程，給士族藉助碑誌編撰譜牒提供了鮮活的例證。其三，在跨領域方面，本書通過會通比較中外貴族和譜牒情況來探討中古中國士族和譜牒的面貌。比如本書論述中古精英階層或統治階層性質，參考了歐洲不同層次、性質貴族的稱謂(頁332)；再如作者提出中古「氏族譜也很可能以女性家族為主」，藉鑒了12世紀英國貴族家譜的情況(頁139)；又如探討北朝隋唐「四姓」，舉證日本「平、原、橘、藤四姓」作為參考(頁281)。參照外國貴族和譜牒，既可為理解中古士族和譜牒提供輔證，又能呈現中古士族和譜牒的特色。

跨學科、跨斷代、跨領域對話理念，貫徹全書始終，豐富了中古士族譜系與譜牒研究的理論、視角和材料。這一研究理念更深植於本書對太原王氏、郭氏和白氏的個案考察中，更新了士族個案研究的方法論。作者指出士族個案研究不應停留在實證層面，而應「超越」個案和「會通」個案，「從不同時段、不同領域關照個案對象，觀察、體會和比較其中的變化與不變」，以期完整呈現個案家族的不同側面，進而「試圖總結其中的共同和差異」(頁313)。本書下編通過個案研究揭示出中古士族譜系的構成與意義，即是上述方法論運用的典範。

當然，本書也存在可探討或改進之處：首先，本書探討中古譜牒的內容和形式，卻未分辨不同類型譜牒的異同。未辨明此點，復原的中古譜牒面貌，難免存在疑議。事實上，總譜或州郡譜中「某氏譜」與士族私譜、家譜在內容和形式上當存在一定差異：前者當有大致統一的內容和形式，而後者卻未必如此。是故，墓誌中姓氏起源、房支分化和近世祖先譜系婚宦，能否一併視作各類中古譜牒的內容構成，還存在可斟酌和探討的空間。

其次，本書注意到中古士族範圍或邊界存在「氏族」(clan)、「宗族」(Lineage)和「擴散家庭」等爭議，並提出「同姓共同體」說；但「同姓共同

體」是否即為士族範圍或邊界，尚可探討。各「士族」是共享同一郡望的家系、房支，亦即「同姓望」群體，而非僅「同姓」而已。同一士族內部的各個家系、房支，也未必稱得上是「共同體」。此外，「同姓共同體」概念忽視了「士族」作為「士」的一面。因此，準確來講，「士族」是享有同一郡望的、具備政治社會門第身份或特權的同姓家系、房支集合。倘如此界定「士族」，關於中古士族譜系構建的方式和意義，或可得出新的認識。

最後，本書在史實認識和史料徵引上，存在疏忽或筆誤之處。比如作者徵引北齊〈高孝瑜墓誌〉「十亂出周姬之朝，八愷興高陽之世」，認為「周姬」「高陽」是高氏家族祖述的華夏祖先（頁100、166）。但此處實用賢臣輔政之典，稱讚高孝瑜輔政之功，與祖先記憶無涉。而〈高孝瑜墓誌〉曰「導原伊嶽，發社惟姜」，才是追溯高氏起源上至姜姓，與北齊皇室通常祖述炎帝、齊太公的做法相合。再如作者稱「北魏胡人墓誌，似乎並無將祖先遠溯秦漢及上古人物之俗」（頁189），但北魏胡人墓誌實不乏祖溯黃帝、昌意、夏后、虢叔等上古人物之例。復如作者舉證今本《元和姓纂》徵引《露氏譜》（頁92），但岑仲勉校記已指出該條實為《顧氏譜》之訛。又如作者稱〈後漢書·魯恭傳〉中「世吏二千石」之說「出自南朝沈約之手」（頁16），「沈約」顯為「范曄」之誤。此類零散疏誤，對書中個別局部觀點不無影響，但未動搖本書整體認識。

儘管尚存可探討和改進的空間，但整體而言，本書堪稱近年中古士族譜系和譜牒研究領域極富貢獻和價值的一部力著。作者考辨中古譜牒的內容、形式和功能，闡釋士族譜系構建的方式與意義，為日後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作者提倡跨時段、跨學科、跨領域對話，援引人類學、社會學理論方法，則為士族研究提供了典範和方向。

[本文為吉林省教育廳人文社科研究重點項目「漢魏南北朝炎黃祖先記憶與『中華』認同」（JJKH20231119SK）研究成果]

陳鵬

吉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